

◆ 社会学书系

MINGUO SHIQI DE HEHUANG
DIFANG SHEHUI

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



关丙胜◎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助(10YJA850014)
新疆师范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资金资助出版

◆ 社会学书系

MINGUO SHIQI DE HEHUANG
DIFANG SHEHUI

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



关丙胜◎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关丙胜著.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2

ISBN 978 - 7 - 5130 - 2577 - 5

I. ①民… II. ①关… III. ①社会史—研究—青海省—民国 IV. ①K294.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5398 号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以河湟地区为区域视野，以民国时期为时间区间，从国家社会对地方社会的影响、河湟地区自然与人文生态、民族人口结构、民族关系、宗教信仰、主要民俗活动、地方主要事件、西方人的活动与影响、人口迁移、民间曲艺、现代性的渐近等维度展现区域内特定时段内的社会情景，同时以此为基础提出民国时期河湟地方社会基本特色及其主要成因，以期总结多族群共居区内各族群既独立又共享资源的理论解说。



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

关丙胜 著

出版发行：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http://www.ipph.cn>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 编：100088

责 编 电 话：010-82000860 转 8393

责 编 邮 箱：flywinda@163.com

发 行 电 话：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 行 传 真：010-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北京中献拓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6.75

版 次：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字 数：310千字

定 价：49.00 元

ISBN 978-7-5130-2577-5

出 版 权 专 有 侵 权 必 究

如 有 印 装 质 量 问 题，本 社 负 责 调 换。

自序

—

2007年秋的一天，一辆小汽车驶向位于河湟地区最西端日月山脚下的哈城村。车上两位头戴白帽的穆斯林中年男人搀扶着一位头戴白色盖头的老太太下了车，老太太仔细查看着前方的哈城村及周边的地形山势，似乎肯定着内心的某种猜测。几位年轻人向这边走来，老太太一行上前问道：“请问这里是哈拉库图^❶吗？”几位年轻人对视后说：不是，我们村叫“哈城”。老太太一行继续往村里走去，又询问了迎面而来的几位中青年人，但答案都是否定的。最后，他们又到村戏台院子里问几位老人，老人们都说这里就是哈拉库图。老太太听后老泪纵横，说她就是哈拉库图的姑娘，70多年过去了，今天终于又回到了家乡。随后，村里的几位高龄老人被引荐见面，他们认出了头戴盖头的老太太。原来，老太太是汉族，出生在哈拉库图，现在简称为哈城村。20世纪30年代后期，15岁的她被驻守在城内的甘肃临夏籍回族军官看中，娶回临夏后完全过着回族穆斯林的生活，直到现在才在儿子和孙子的支持下凭着儿时的一点点记忆重回故土。^❷

老太太的侄子一直生活在村里。他回忆说：小时候父母亲提及家族内有一位老姑姑被当时驻守在村里的回族军官娶走了，认亲那天，家里的老老少少哭成一团。之后一直没有任何音信，没想到她居然回乡省亲了。看着老太太全身的回族穆斯林打扮以及她的儿子和孙子，几个侄子及其子女都唏嘘着人生的无常。

2008年12月，笔者一到今青海省湟源县日月乡哈城村^❸田野，立即被这

❶ 蒙古语，黑城之意。

❷ 对于被回族军官娶为妻一事，村里老人有如下三种说法：一是说该军官有权势，见这个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便强行娶其为妻；二是军官看到这个姑娘长得非常漂亮，就设计并借给姑娘的父亲很多钱，最后姑娘的父亲因抽大烟无力偿还债务即用姑娘抵债；三是说姑娘的父亲本来向军官借了许多钱，最后以女抵债。

❸ 即哈拉库图，有关该城的一些情况在正文中有所叙述。



里的风雨沧桑和丰富故事所吸引。作为河湟最西端的地区，这里是青海省农业区与牧业区的交接地带，也是历代兵家的驻防之地。曾几何时，这里商家林立，繁华昌盛。更为重要的是，在明代后期至清代中期，这里是青海蒙古族的驻军之地；清代后期至民国中期，这里又是回族军阀的驻军之地；更为有意思的是，这里的主体居民也经历了从汉族到回族，再从回族到汉族的转变。自清末哈拉库图的回族迁走后，居民几乎全部是汉族，他们修关帝庙、城隍庙、戏台，耍社火，使哈拉库图成为河湟地区典型的汉族村落。

让人感怀的是：短短几十年时间，一个区域内并不起眼的村庄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村庄内的年轻人毫无察觉，它原来的名称因人们不经意的简称已成为随风而逝且与己无关的地名。从哈拉库图到哈城，难道其变化仅限于几个字的差别吗？一个小小的村庄如此，那么整个区域又会如何呢？这些问题，正是笔者2008年年底在哈城村田野中偶然听到上述故事之后的思考。

二

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究竟如何？国内外学者对此有着丰富的论述和见解。

在传统国家时代，受国家控制力的局限，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因国家政治中心与某个地方地理距离的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一般而言，离政治中心越近，国家与该地方社会的关系就越密切；而离政治中心越远，那么国家与该地方社会的关系也就越疏远。单从地理距离而言，国家之内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之相对应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也是如此，“除此而外，国家更多的只是一个象征符号，普通百姓很少能感受到其真切存在。县以下的乡村基层社会更多的都是由乡村权威在非制度的层面上进行管理与控制，乡村权威一般由族长、地方绅士及其他具有较大影响的人士所组成，他们承担并体现着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以确保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的有序运行。政府主要依靠宗族制度和地方士绅来对广大乡村地区进行间接统治，宗族制度和地方士绅一起构成了非官方的乡村控制系统。”①

在现代国家时代，这种定律的效力已经大大降低，即：随着现代国家控制力的极大提高（主要得益于人类科技的不断进步），遥远的地方已经不再遥远，距离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和全球化所消解，促使地方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日

① 任吉东. 多元性与一体化：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治理 [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33.

益紧密。然而，无论如何，地方社会与国家还是不能等同，两者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学术上，都无法重合。尽管国家控制力得到极大增强，全球化无处不在，但地方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中表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质。

民国时期（1911~1949年）正是河湟地区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迈进的变革时期，决定这一地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因素，除上述地理距离的因素外，还有河湟地方社会中的多民族特性。满清王朝的倾覆、民国的建立、国家力量的进入、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的成长与政权的建立，这些“国家之事”多多少少进入到河湟地区的乡野，成为影响与左右河湟地方社会的推力。然而，与国家范围内的诸多地区相比，这些“国家之事”对河湟地方社会带来的影响相对有限。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总体上还是处于内在力量的不断推动之下。尽管我们无法体认河湟地方社会中诸多文化具象在民国以前的具体情形，但对民国时期及之后的延续状况至少还是能够有整体和局部的认识及把握。同时，正如许多学人指出的那样，地方社会不仅可以呈现区域内人群在一定时段内的社会生活状态，使人们了解到其交际、结群、文化展演、资源利用等的具体情形，而且还可以反过来折射“国家社会”，使人们得以从地方看到国家面貌的蛛丝马迹。这种从地方看国家的视角与从国家看国家的视角相比，不单是视角的转换，还可以形成地方对国家的重新理解、国家对地方的全新认识，也会在这种互动认识中造就国家与地方关系的新场域，最终形成国家与地方的认知互动，使两者的关系更密切。

正因如此，对民国时期河湟地方社会面貌的勾勒与呈现也就有其特殊的 value。与国家的大部分地区相比，河湟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交织的特性与特殊的自然地理生态相结合，使其不仅成为地理单元的一隅，也成为社会文化单元的交汇区。除历代政府职员中的一些官员外，清末以来一些西方传教士进入河湟地区并记录了大量地方社会素材。民国中期开始，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随着国家对边疆地区有意识的经略，大批贤士仁人、政商名流来到河湟地区，留下了十分可观的风土人情记录。此时，国家的大部分律法与统治模式还无法涉及河湟地方社会，河湟地方还是惯用着自己的治理模式，但在教育制度、现代科技的运用等方面已今非昔比，已经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于是，“传统”与现代、国家与地方、他域与我域之间的多元交错成为民国时期河湟地方社会的基本色调。

三

既然是地方社会，也就应该充分突出“地方”。然而，一个貌似有着十分



相似文化特质的区域性地方社会中，还存在着许许多多更小的“地方”，河湟地区便是这种典型。当一种研究的视角扫向一个特殊的地理区域，常产生麻痹研究者的同质性驱动，它常牵引研究者进入浩瀚的田野以期得到能够充分展示其见解的社会现实材料。然而，随着田野的深入，研究者才发现事实远比想象复杂得多。河湟地区虽然有着很多的社会文化同质性，但这些貌似“同质性”的社会文化事实其实千差万别，甚至相互矛盾，在看似一致的表相下隐藏着明显的区隔。作为研究者，如何全面地揭示和呈现这些深层的差异，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譬如，从整体来看，河湟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就非常明显。^①这种差异除十分直观地表现在语言的使用上外，还存在于诸多的社会文化表相的操演上。就河湟地区除穆斯林群众外的人们每年最大规模的祭祖扫墓活动而言，东部地区与中原许多地区一样，是在每年的清明节^②进行，而西部大部分地区则完全不知什么是清明节，每年的祭祖扫墓活动均在“田社”（即春分日）这天进行^③。造成此种鲜明区隔的原因不得而知，但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河湟东西部地区之间社会文化事实的差异。

同时，正如上文所提及，在河湟地区的同一村庄之内，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表相差异较大。以笔者生长于斯的河湟西部地区的一个小村庄来说，在不到1000人的村庄之内，汉、回、藏三个民族的人口数均占相当比例，还有几户蒙古族群众。三个民族间无论是在宗教、语言、生活习俗、谋生手段、社会组织上，还是在文化展演上均存在很大不同。笔者的拙文《“原生态”文化的制造：河湟西纳地区阳坡村的“要牦牛”仪式》与《文化的演进博弈：河湟西纳地区阳坡社火的历程》^④正是呈现和分析这一村庄及周边地区的文化操演，但读者必须清楚：居于此村庄之内的100多户回族人与此毫无关系。

对如此复杂的地方社会要在一本书中得以面面俱到的呈现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本书在以河湟西部地区为基本视点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覆盖整个河湟地区，在重点中寻求普遍性，对普遍性的社会文化又以典型地区乃至村庄为呈现基点。这样做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呈现的方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① 对河湟东、西地区的划分请参见正文。

^② 该节日原为冬至日后的第108天，1935年始由中华民国政府规定成为国定假日。

^③ 这种活动与流行在中国南方客家地区的“春祭”活动极为相似。

^④ 关丙胜. “原生态”文化的制造：河湟西纳地区阳坡村的“要牦牛”仪式 [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42—47；关丙胜. 文化的演进博弈：河湟西纳地区阳坡社火的历程 [J]. 青海民族研究，2013（1）：40—48.

四

百年以来，人类学的民族志由传统民族志迈向科学民族志，并逐步出现了以后现代主义思潮为取向的自我民族志。期间，人类学家除对所研究的对象进行全方位的社会文化事实描摹与呈现以外，往往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人类社会普遍性的社会文化程式，并据此概括出某种理论。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促使人类学理论的逐步成熟，也造就了一代代人类学者依此进行对他社会的思考，进而加深了人类学者对人类社会事实的探索程度。这里，理论的指导意义不言自明。

然而，人类学不得不反思的是：基于社会事实理论探索的民族志的生命究竟如何？至少，在坚持这种民族志范式的同时，人类学需不需要一些返归到纯正社会事实的民族志？或者至少部分地返归？窃以为，诸如本研究一样的地方社会的描述应该回归到这种“纯正文本”。因为，对某一地方社会的呈现，主要是基于地域与社会文化事实两个大的方面并对其进行的记录，而不是理论归纳或者探索。相信这种仅限于记录的民族志会给未来社会及其学者以极大的协助。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和目的，本书偏向于对民国时期河湟地方社会进行基本勾勒，并借由大量当时的记述得以呈现。也正因如此，本书的名称是“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而不是“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研究”。

五

在本研究实施的几年里，得以抽身混迹在河湟地区的乡野。每到一处，几乎都能想起民国时期文人志士、官员名流对这个地区的某些记述片段，也常常在眼前出现某个历史人物在山冈、岸边、山谷大道以及小镇的幻觉。听着老人们诉说起或闻或亲身经历的故事乃至传奇，民国时期河湟地方社会的全貌便在脑海里冒出，与各种记述发生吻合或碰撞。

几年的田野也使自我的认知发生了极大改变，本来一直自认为不过如此的一些乡村在走进以后却发现魅力无限：不仅潜隐着许多河湟地方社会事实原型，也有许许多多悠然地生存于其间的能言善辞的民间精英，与他们无所顾忌的对话与闲聊是本研究诸多材料的起点。

正如本序开头所呈现的传奇故事一样，社会现实必将成为历史，身处此间的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点滴有朝一日定会成为未来社会学者们难以厘清的难题。哈拉库图的沧桑巨变正是河湟地方社会的缩影，它折射了地方社会在历史面前的价值与意义，也折射了记录这些社会事实文本的价值。



近几年来，以河湟地区为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涉及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等学科，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区域内本土学者的成长，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河湟”本身具有的社会文化特性，期望本书能和这些研究成果一起，对河湟地区的学术研究有所裨益。

是为序。

关丙胜

2014年3月9日于乌鲁木齐

目 录

第一章 河湟地域指涉	1
一、汉文史籍中的“河湟”	1
二、“河湟”地域的指涉范围	8
第二章 河湟地区的自然生态与资源	11
一、河湟地区的自然生态	11
二、河湟地区的农业资源	13
三、河湟地区的非农业资源	18
四、河湟地区的资源边界	23
第三章 河湟地区的社会结群	26
一、河湟地区的族群与村落	27
二、河湟地区的其他形式结群	32
第四章 民国时期河湟地区的民间信仰	45
一、河湟地区的山神信仰	45
二、“王辨会”及其信仰	67
三、“猫古神”和“古典”信仰	70
四、青海湖信仰	74
五、关公、城隍、文昌等民间信仰	76
第五章 民国时期河湟地区地方社会中的社火展演	82
一、河湟社火的整体情形	82
二、河湟西纳拉沙地区的社火	85
三、贵德地区的亦扎石社火	105



第六章 河湟地区地方社会中的曲艺与习俗	112
一、河湟地方社会中的曲艺	112
二、河湟花儿	119
三、地方社会中的岁时节庆及游艺习俗	123
四、地方社会中的婚丧仪式及习俗	131
五、地方社会中的其他习俗	136
第七章 宗教与民国时期的河湟地方社会	140
一、藏传佛教与地方社会	140
二、伊斯兰教与地方社会	162
三、西方宗教与地方社会	168
四、其他宗教	173
第八章 民国时期河湟地区的重大事件与地方社会	175
一、“反清”及“复清”事件	175
二、马仲英及河湟事变	180
三、四路红军被俘事件	200
四、抗日战争与河湟地方社会	202
五、十四世达赖喇嘛与十世班禅灵童“转世”河湟地区	211
第九章 记述中的民国时期河湟地方社会	216
一、记述中的总体情形	216
二、记述中的河湟地方宗教与民族	224
三、记述中的河湟地方风貌	230
四、其他记述	243
参考文献	253

第一章 河湟地域指涉

今天，人们使用的“河湟”这一地域指称，很大程度上是以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框定，可以理解为对特殊文化区域的称呼。这种称呼多用在学术研究及各种文化表述之中，却很少以官方地名的形式出现。一特定地域命名的变迁不仅昭示出地域之内所经历的历史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生活在此间的人们（尤其是知识精英）对该地域曾有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传述与拾回。历数不同时代汉文典籍中“河湟”一词出现的情境及地域指涉的变化，可以咀嚼到地方与国家之间由远及近的渐近过程。

一、汉文史籍中的“河湟”

“河湟”一词在中国历代文献典籍中出现较多，但对其具体指涉地域范围的明确表述却较少，一般都是在记述事件或人物时出现。

在中国典籍中，“河湟”的首次出现是在成书于东汉时期（25~220年）的《汉书》中，该书大量记载了与羌人有关的事件。西汉时，中央权力直接进入河湟及其以西地区，对羌人的用兵以及对河湟地区的开发治理多与赵充国联系在一起。因此，《汉书》在记述西汉时期经略河湟地区的著名人物赵充国时，多次提到河湟。如赵充国向汉王朝提出的经略羌人“十二事”中便有如下记述：

臣谨条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墜，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视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瘡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陼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



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国材下，犬马齿衰，不识长册，唯明诏博详公卿议臣采择。^①

在记述赵充国与羌人的征战情形时，也曾提到“河湟”，如：

明年五月，充国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饥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遗脱与煎巩、黄羝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诡必得，请罢屯兵。”奏可，充国振旅而还。^②

成书于南朝刘宋时期（420~479年）的《后汉书》在记述羌人时也曾提到河湟。

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③

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渡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开罕。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人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④

可见，史籍中“河湟”的首次出现是在《汉书》中赵充国的列传中，赵充国生活在公元前137~公元前52年之间，他不仅有勇略，而且熟悉匈奴和氐羌的习性，曾随将军李广利出击匈奴，平定武都郡氐族的叛乱。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平定了羌人的叛乱，始在今河湟地区进行屯田。公元前60

① 汉书·列传·赵充国（卷六十九）[M].

② 汉书·列传·赵充国（卷六十九）[M].

③ 后汉书·西羌传·无弋爰剑（卷八十七）[M].

④ 后汉书·西羌传（卷七十七）[M].

年，诸羌人投降，西汉王朝才实现了对河湟羌人的有效管辖。但即使如此，也不能由此认定“河湟”这个词在赵充国时代就已使用，毕竟《汉书》的成书时间比历史发生时间要晚很多年，《汉书》所罗列的西汉时期的行政设置中也没有出现“河湟”一词。当时管辖河湟地区的郡县是金城郡，对金城郡的设置情况，《汉书》中记述如下：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县十三：允吾，乌亭逆水出参街谷，东至枝阳入湟。莽曰修远。浩门，浩门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莽曰兴武。令居，涧水出西北塞外，至县西南，入郑伯津。莽曰罕虏。枝阳，金城，莽曰金屏。榆中，枹罕，白石，离水出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莽曰顺砾。河关，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东北入塞内，至章武入海，过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安夷，允街，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修远。临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西有须抵池，有弱水、昆仑山祠。莽曰盐羌。^①

以上记载不仅透露出许多羌人信息，也隐含了“河湟”地域与羌人之间的紧密联系。从中可以看出，虽然迄今为止没有在《汉书》之前的古代典籍中看到对“河湟”的直接记录，但显然“河湟”的地域指称至少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至迟在东汉前期开始出现在史籍中。从《汉书》和《后汉书》提及“河湟”的内容中无法准确判断其所指涉的地域界线，但可以确认其所指的核心就是今西宁为中心的湟水流域。而“河湟间”一词的使用说明该地域指的是从黄河至湟水之间的广大地区。

唐初房玄龄（579~648年）等撰修的《晋书》中有如下记载：

十一年，炽盘攻克沮渠蒙逊河湟，太守沮渠汉平，以其左卫匹达为河湟太守，因讨降乙弗窟干而还。遣其将昙达、王松寿等讨南羌弥姐康薄于赤水，降之。^②

唐代时，“河湟”一词不仅多次出现在史籍中，也经常出现在文人的诗歌等作品中。如《旧唐书》中有如下记述：

元鼎还，虏元帅尚塔藏馆客大夏川，集东方节度诸将百余，置盟策台上，遍晓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策署彝泰七年。尚塔藏语元鼎曰：

^① 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M].

^② 晋书（卷一百二十五）[M].



“回鹘小国，我尝讨之，距城三日危破，会国有丧乃还，非我敌也。唐何所畏，乃厚之？”元鼎曰：“回鹘有功，且如约，未始妄以兵取尺寸地，是以厚之。”塔藏默然。元鼎逾湟水，至龙泉谷，西北望杀胡川，哥舒翰故壁多在。湟水出蒙谷，抵龙泉与河合。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流澄缓下，稍合众流，色赤，行益远，它水并注则浊，故世举谓西戎地曰河湟。河源东北直莫贺延碛尾殆五百里，碛广五十里，北自沙州，西南入吐谷浑浸狭，故号碛尾。隐测其地，盖剑南之西。元鼎所经见，大略如此。^①

这是汉文史籍中首次对河湟地区形貌进行的记述，可以看出河湟地区与西戎直接相关联，而其所指的地域包含甚广，涵盖黄河上游诸多地区。

《全唐诗》中出现“河湟”一词的诗歌有29首，而诗题中出现“河湟”一词的有3首：

河湟有感^②

司空图

一自萧关起战尘，河湟隔断异乡春。
汉儿尽作胡尔语，却向城头骂汉人。

河湟旧卒^③

张 乔

少年随将讨河湟，头白时清返故乡。
十万汉军零落尽，独吹边曲向残阳。

河 湟^④

罗 鄚

河湟何计绝烽烟，免使征人更戍边。
尽放农桑无一事，遣教知有太平年。

唐代时“河湟”一词大量出现在官史文献和文人诗作中，一方面是因为唐王朝与吐蕃王朝在河湟地区的战争对峙，另一方面也说明“河湟”地域的指涉在此时已经广为人知。

① 新唐书·列传（卷一百四十一下）[M].

② 全唐诗（卷六百三十三）[M].

③ 全唐诗（卷六百三十九）[M].

④ 全唐诗（卷六百五十四）[M].

到宋代，“河湟”一词仍频繁出现在官方史料中，且对今河湟地区的行政设置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如：

熙州，上，临洮郡，镇洮军节度。本武胜军。熙宁五年收复，始改焉。寻为州。初置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熙州、河州、洮州、岷州、通远军五州属焉。后得兰州，因加“兰会”字。元祐改熙河兰会路为熙河兰岷路，元符复故。会州既割属泾原，又改为熙河兰廓路，宣和又改为熙河湟廓路，又改湟州为乐州，又改为熙河兰乐路，寻复改为熙河兰廓路。旧统五州军，兰、廓、西宁、震武、积石六州军相继来属，又改通远军为巩州，凡统九州、三军。崇宁户一千八百九十三，口五千二百五十四。贡毛毼段、麝香。县一：狄道。中下。熙宁六年置，九年省。元丰二年复置。砦一：康乐。熙宁六年，置康乐城为砦，省马蹄砦。马蹄砦旧属秦州长道县。堡九：熙宁五年，置庆平、通谷、渭源、北关。六年，改刘家川为当川，置南关、南川。七年，置结河。元丰七年，置临洮。通谷，庆平，渭源，结河，南川，当川，南关，北关，临洮。东至定远城四十里，西至定羌城界三十五里，南至熙州六十五里，北至阿干堡七十里。安羌城，宣和六年，赐熙河兰廓路新建溢机堡名为安羌城，不知属何州军，姑附于此。广平堡。

河州，上，安乡郡，军事。熙宁六年收复。崇宁户一千六十一，口三千八百九十五。贡麝香。县一：宁河。熙宁六年，置枹罕县，九年省。崇宁四年，升宁河砦为县。旧香子城。城一：定羌。熙宁七年，改河诺城为定羌城。砦一：南川。熙宁七年，置南山堡，寻改为南川砦。堡四：熙宁七年，置东谷。八年，置阎精。元丰三年，置西原、北河二堡。东谷，阎精，西原，北河。关一：通会。熙宁七年置。循化城，旧一公城，崇宁二年收复，改今名。别见“乐州”。东至怀羌城四十五里，西至积石军界一百余里，南至下桥家族地分一百余里，北至来同堡六十五里。大通城，旧达南城，崇宁二年收复，改今名。别见“乐州”。东至通津堡界十五里，西至菊花河六十里，南至朴水原二十一里，北至宁塞堡界十五里。安疆砦，旧名当标城，崇宁二年收复，改今名。别见“乐州”。东至来同堡三十三里，西至通津堡五十里，南至循化城一百一十里，北至黄河二十里。怀羌城，崇宁三年，王厚收复。东至南川砦六十里，西至循化城六十五里，南至洮州界一百七十余里。北至安疆砦一百七十里。来羌城，崇宁三年，王厚收复。东至安乡关七十里，西至大通城界三十八里，南至南川界四十八里，北至黄河二十里。讲朱城，元符二年，洮西安抚司收复河南讲朱、一公、错凿、当标、形撒、东迎六城，寻弃之。崇宁二年，再收



复。除一公改循化城，当标改安疆砦，余四城皆未详。按：讲朱、错凿、一公、当标皆在河州之南，元符二年，边廝波结先以此四城来降，未几，王瞻乃进据之。错凿城，形撒城，东迎城，宁河砦，崇宁四年，已升宁河砦为县，别有宁河砦。东至定羌城三十里，西至河州四十五里，南至通会关三十里，北至河州界二十里。……①

建中靖国初，议弃湟州，诏访雄利害。雄以为可弃，遂以赐赵怀德，徙雄知熙州，进华州观察使。蔡京用王厚复河湟，治弃地罪，停雄官，光州居住。三年，得自便。后论为责轻，复窜金州。明年，乃听归。高永年死，西宁诸戍阻绝，起雄权经略熙河、安辑复新边使。知沧州，加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复为熙州，迁安德军节度观察留后、步军副都指挥使，拜武康军节度使。……②

王韶取镇洮，授为先锋，破香子城，拔河府。羌虽败，气尚锐，辄围香子以迎归师。韶遣将田琼救之，琼死，乃简骑五百属授，授奋击败之。休士二日，羌复要于架麻平，注矢如雨，众惧，授令曰：“第进毋恐！毡牌数百且至。”行前者传呼，羌惊乱。力战数十，斩首四千级。又破之于牛精谷，取珂诺城，尽得河湟地。③

和官方史料相呼应，民间史书《青唐录》④ 也对 11 世纪河湟流域的地域指涉作了明确记述：

青唐⑤、邈川⑥，其地在黄河之曲，直西成都数千里，北展河湟间二千余里。河湟间有鄯⑦、洮⑧、河⑨、渭⑩、岷⑪、叠⑫、宕⑬、廓州⑭，

① 宋史·志（卷八十七）[M].

② 宋史·列传（卷三百四十九）[M].

③ 宋史·列传（卷三百五十）[M].

④ 《青唐录》原为南宋吏部侍郎徐度家藏抄本，经其亲自校定，封面题“青唐录”三字。元延祐中，陆友仁从书肆中购得，据传是北宋李远所著。后来有人见汪彦章墓志，记述汪氏著有《青唐录》二卷，但现存本并不分卷，故《青唐录》被认为仍是李远所著。

⑤ 今青海西宁，唐末时为吐蕃所据，称青唐。宋崇宗三年（1104 年）复其地，始称西宁州。

⑥ 近青海乐都南，唐为鄯州，后卫吐蕃所据，称邈川。

⑦ 即鄯州，今青海湟源至民和，为唐鄯州，州治今乐都。

⑧ 即洮州，今为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卓尼。

⑨ 即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

⑩ 即渭州，今甘肃渭源、陇西、武山等地。

⑪ 即岷州，今甘肃岷县一带。

⑫ 即叠州，今甘肃迭部和四川若尔盖东北一带。

⑬ 即宕州，今甘肃宕昌、舟曲一带。

⑭ 今青海尖扎、贵德、循化县部分地区。